

试论桂林抗战戏剧运动中党的领导

刘 焕 林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广西桂系军阀与蒋介石有矛盾,桂系军阀出于捞取政治资本的目的,在政治上尽量表现开明,加上桂林是抗战后方,因而很多革命文艺工作者和文化界知名人士,都云集到桂林,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当时桂林文化活动中最活跃、最有声色的是戏剧。

抗战时期,在桂林活动的戏剧家和演员很多,著名的有田汉、欧阳予倩、夏衍、洪深、瞿白音、焦菊隐、章泯、马彦祥、杜宣、洪道、熊佛西、唐槐秋、金山、许之乔、万籛天、汪巩、严恭、许秉铎、吕复、朱琳、刁光覃、石联星等。他们编剧、导演、演戏、出版戏剧刊物、开办训练班、举办讲座、普及戏剧知识、培训戏剧干部,日以继夜地为“抗日救亡”贡献力量。

在桂林活动和到过桂林演出的戏剧团体也极多,计有“新中国剧社”、“国防艺术社”、“广西艺术馆话剧实验剧团”、“桂剧实验剧团”、“海燕剧社”、“凯声剧团”、“四维平剧社”、“复兴剧团”、“新安旅行团”、“青年铁血抗敌剧社”、“前锋剧团”、“中国艺联剧团”、“军委政治部孩子剧团”、“旅港剧人剧团”、“香港少年剧团”、“留桂剧人实验剧社”、“抗敌演剧四队”(原一队)、“抗敌演剧五队”(原九队)、“上海救亡演剧二队”、“上海儿童剧团”、“广州儿童剧团”、“厦门

儿童剧团”、“西南抗战流动剧团”、“朝鲜义勇队”、“抗敌会话剧组”、“七七剧团”、“平剧一队”、“血光剧团”、“乐群剧团”、“丽华平剧团”、“文艺歌剧团”、“香港粤剧救亡服务团”、“江西省戏剧工作者代表团”等,此外还有“青年剧团”、“青年剧社”、“桂邮剧团”、“长虹剧艺社”、“月朗剧团”、“社会剧团”、“广西省会学生抗敌后援会暑假救亡工作团”、“西大青年剧社”、“西农剧社”、“桂中话剧社”、“桂初中剧团”、“逸仙中学剧团”、“汉中剧团”、“培联剧团”、“桂林女中话剧团”、“培正中学风暴剧社”等业余剧社、剧团。这么多剧社、剧团集中在桂林,是桂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他们的活动演出,给这座大西南的“文化城”带来了蓬勃的朝气。

这些剧团、剧社,演出的剧种繁多,有话剧、桂剧、粤剧、平剧、木偶剧、街头剧、活报剧、新歌剧、舞剧和杂技。其中,特别是话剧,在桂林戏剧舞台上占的比重更大。上演的节目,琳琅满目。“新中国剧社”、“话剧实验剧团”、“国防艺术社”等演了话剧《大地回春》、《复活》、《虎符》、《孔雀胆》、《日出》、《北京人》、《蜕变》、《心防》、《法西斯细菌》、《水乡吟》、《愁城记》、《秋声赋》、《阿Q正传》、《大雷雨》、《钦差大臣》、

《风雨归舟》(原名《再会吧,香港!》)、《重庆二十四小时》、《胜利进行曲》、《戏剧春秋》、《夜上海》、《长夜行》、《国家至上》、《塞上风云》、《旧家》、《面子问题》、《一年间》、《海恋》、《忠王李秀成》、《天国春秋》、《明末遗恨》等,桂剧实验剧团演了《梁红玉》、《桃花扇》、《木兰从军》、《渔夫恨》、《人面桃花》、《搜庙反正》、《胜利年》等;“新安旅行团”、“广州儿童剧团”、“厦门儿童剧团”、“长沙儿童剧团”等小演员们演了不少儿童剧,计有舞剧《虎爷》,话剧《中国小主人》、《捉汉奸》、《帮助咱们的游击队》、《小英雄》,傀儡戏《小红帽》、《国王与诗人》、《三只小花猫》等。演出剧目不下三百个,几乎每月都有好几个新节目上演,真是繁花争妍,盛极一时。

特别能为桂林抗战戏剧运动增添异彩的是盛况空前的“西南剧展”。这个剧展于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五日在桂林隆重开幕,历时三个月。参加剧展的有广西、广东、湖南、江西、云南五省三十三个戏剧团队(其中话剧团队二十个,京剧团队五个,桂剧团队三个,其他五个),到会人数近千人。演出期间,以田汉为首,组织了有周钢鸣、孟超、骆宾基、秦牧、华嘉、秦似、洪道、许幸之、陈尔冬、韩北屏参加的十人剧评小组,每看一个戏,都集体讨论,推人执笔写评论文章,为剧展宣传,大造声势,以扩大它的影响。西南剧展确曾轰动整个大西南乃至全国,为桂林抗战戏剧运动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为什么在短短几年中桂林会产生这种戏剧运动的盛况呢?有人说,主要原因是由于桂系李、白、黄的“开明”,这种“开明”论显然是错误的,产生剧运盛况的原因主要在于党的领导。党如何领导抗日战争时期的桂林戏剧运动呢?这个问题,如果是文化大

革命之前提出来,问题好解决得多。因为当时许多地下党的领导同志,特别是文化界的党的领导同志都还健在,只要去走访他们,对党领导这条红线的来龙去脉便容易得到清晰、明确的答案。然而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惨重的浩劫,不少宝贵的资料丧失了,懂得当时实情的一些卓越的党的领导同志都被万恶的“四人帮”迫害致死了。如前四川省宣传部部长李亚群同志,前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邵荃麟同志,都是党领导桂林抗战文艺运动的重要知情人。李亚群同志是八路军办事处被迫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撤离桂林后,南方局根据桂林作为一个文化城的特殊情况,为了加强文化界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专门派到桂林来的,他是南方局直辖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委员。他当时掌握一个电台,直接与周恩来同志联系。他领导桂林文化界党的工作,杜宣同志就曾直接由他领导。邵荃麟同志当时任东南局文委书记、桂林文化工作小组组长。可惜这两位同志都由于“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过早地与世长辞了!今天要论证桂林抗战戏剧运动与党的领导的关系困难较大,但即使无法从组织上弄清党领导桂林抗战戏剧运动的来龙去脉,我仍然认为,桂林抗战戏剧运动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

党领导桂林抗战戏剧运动体现在哪里呢?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每个历史时期,它都根据特定的历史情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制定了自己的方针和政策,因而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是通过无产阶级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来体现的。考察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戏剧运动的产生及其发展,我们就会发现,桂林抗战戏剧运动的盛况是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和推动下形成的。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蒋介石集团就集中全力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我党当然也针锋相对，集中全力进行军事上和文化上的反“围剿”。“围剿”和反“围剿”，是生死的搏斗，矛盾非常尖锐，斗争十分残酷。国共两党处于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状况。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袭击沈阳，侵占了我国东三省。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芦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政治上的主要矛盾。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对日作战。根据这种情况，芦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便向全国发出宣言，号召各党派各阶层一致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被迫声明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两党又重新实现了合作。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和召唤，对桂林抗战戏剧运动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影响。首先我们有了公开的机构，如以李克农同志为首的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使我们有了一个具体的领导核心。其次有了公开发行的报刊，如《救亡日报》、《戏剧春秋》、《新中国戏剧》、《戏剧生活》等综合的报纸和专门的戏剧刊物。这些报刊都是共产党人和进步文艺工作者主办的，这就可以作为我们发表剧作、进行戏剧评论、交流经验、开展宣传的阵地。再次是许多的剧社、剧团、剧作家、演员都在我党“抗日救亡”的召唤下纷纷云集桂林，桂林的许多机关、学校也纷纷建立业余剧社、剧团，演抗战戏，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在“抗日救亡”方针的激励下，不少戏剧工作者常常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恶劣环境下坚持排戏、演戏。如“新中国剧社”建社初期，同志们只住在一幢非常简陋的木头房子里，穷到有一天只能吃一顿饭。男同志几个月不能理一次发，头发长得象女同志一样，但他们宁可

忍受生活的煎熬，也坚持排戏、演戏。有时肚子饿得呱呱叫，顶不下去的时候，年纪小一点的便在排演场做游戏，以便借玩兴把肚饿忘掉，他们风趣地把这叫做“饥饿疗法”。这种旺盛的革命精力，就是来源于心中有党，来源于崇高的、神圣的精神支柱——“为抗战救亡而斗争”。可见桂林抗战戏剧运动所呈现的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是和党的政策的感召和推动密不可分的。

统一战线是我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党的领导还表现在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巨大威力。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随着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兴起，苏区文艺运动的出现，文艺界形成了两军对峙的局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政治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在迅速发展。上海成立了全国戏剧界救亡协会，组成了十三个救亡演剧队分赴前线、后方和敌后演出。后来演剧队在武汉经过整编，有的来到了桂林，不少剧团和孩子剧团也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陆续来到了桂林。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武汉成立了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全国文协”），次年十月二日在桂林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简称“文协桂林分会”）。这是一个范围十分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在这个组织里，有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一切爱国的新旧文艺界人士。不同政治信仰，不同思想倾向，不同艺术流派，只要同意我党的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政策，都可以参加到这个组织中来。所以通过“文协桂林分会”这一组织，把云集在桂林的戏剧工作者，统统吸收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抗日戏剧大军，在桂林开展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有声有色的戏剧运动。

在桂林抗战戏剧运动中，党外人士作出

显著成绩的首推欧阳予倩先生。抗日战争爆发后,桂系当局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把欧阳予倩从香港请回了桂林,给他以广西省政府顾问的名义,委托他专抓桂剧改革。他担任广西戏剧改进会会长、广西艺术馆馆长的职务,并抓广西艺术馆话剧实验剧团的工作。文协桂林分会成立后,他参加了这个组织,任第五届理事会的理事。他的思想行动有了鲜明的变化,接受了党的领导,为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发出的“抗日救亡”的号召,毅然把自己的艺术创作全部转换成宣传抗日的內容。他编写(或改编)许多戏剧,如影射当时国民党对外消极抗战,对内压榨百姓的《梁红玉》,赞扬了崇高的民族气节;《桃花扇》鞭挞两面三刀卖国求荣的行为,歌颂忠贞坚定的精神;《忠王李秀成》,抨击制造分裂的行径;《木兰从军》讴歌抵抗侵略、不居功受禄、不享受荣华富贵的品德。他还写了话剧《越打越肥》,揭露、讽刺那些借抗战之机大搞敲榨、勒索,大发国难财的人。这些剧本的主题,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揭露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本质,有助于宣传和贯彻共产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

欧阳予倩先生对于一些取材于现实或借古喻今宣传抗日的话剧特别喜爱,并以他高超的艺术,热情地给予导演。这方面的话剧剧目,经他亲自导演的有夏衍编的《心防》、《法西斯细菌》,于伶编的《长夜行》,阳翰笙编的《天国春秋》等。这些剧目的演出,对于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滔天罪行和国民党的腐败,唤醒人民投入抗战,起过很大的作用。

抗日的道路满布着荆棘,然而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欧阳予倩先生对抗日前途仍信心百倍,写下了一首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爱国诗篇:

“无际忧烦不可言,四周荆棘一痕天,羊肠应是康庄始,手把耰锄辟径前”^①。为了开辟抗日的康庄大道,他不怕困难,披荆斩棘,即使在敌机空袭时,他还在防空洞里给演员们分析剧本。他说:“过去我走过许多弯路,曾经长期受唯美主义和艺术至上的思想所干扰。但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参加了抗战救亡工作的实践,更多受到党的影响和教育。……大敌当前,一切爱国力量应当更紧密地团结起来。”^②说明欧阳予倩先生在桂林抗战戏剧运动中的卓越贡献,是我党统战的结果,与党的领导也是分不开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下,在地下共产党员和进步戏剧工作者田汉、欧阳予倩、瞿白音、熊佛西等的积极活动下,于一九四四年在桂林胜利召开了规模宏大的“西南剧展”,更充分显示了党的统战工作的巨大威力。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同志对桂林抗战戏剧运动的关怀和指导,是党的领导又一鲜明的体现。

周恩来同志当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以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身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担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他来到武汉后十分关心抗日文艺运动的开展,亲自给《新华日报》撰写专论,给文艺宣传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亲自召开会议,给文艺工作者介绍国际国内形势,勉励大家“把舞台当作炮台,把剧场当作战场”^③,为抗日救国出力;全国“文协”成立时,周恩来同志亲临大会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一系列的指示,对抗战文艺运动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周恩来同志对在抗日救亡中起重要宣传作用的戏剧工作特别关心。比如当时经上海党组织同意建立起来的救亡演剧队,上海沦陷后,陆续到达武汉,有的队后来到了桂林。这些演剧队因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的民间团体,在演

出过程国民党找他们的麻烦，他们的活动经费也难于解决。为了使这些演剧队能够开展活动，周恩来同志采取断然措施，在每个队建立秘密党支部，并把它们正式列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编制，改名为“抗敌演剧队”。这是一个非常英明的措施，这是对马列主义的灵活运用，因为挂上“政治部第三厅”的招牌，就可以“用他们的钱，演我们的戏，唱我们的歌”^④。如果不这样做，这些演剧队要在国统区的桂林开展活动是决不可能的。后来战事紧张，周恩来同志又指示夏衍同志利用桂林《救亡日报》（公开合法报纸）主编的身份，与各演剧队保持联系，遇事不能解决时，可通过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向南方局请示。皖南事变前后，来自国民党的压迫就日趋严重了。在这关键时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李克农同志向各演剧队传达了南方局的指示：“演剧队当前的主要任务还是长期隐蔽，保全实力，团结一切要求进步和爱国的人，反对国民党的顽固分子。各地情况不同，必须根据各地具体情况灵活处理。国民党内也有不同派别，余汉谋与张发奎不同，李宗仁和白崇禧也不完全一样，所以应该利用这些矛盾保存自己。要广交朋友，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但一定要坚持原则，不演一出反共戏，不唱一支反共歌，又要谨慎小心，不要冲动急躁，不要自己戴上红帽子。如有遇到被强迫入党时，可拖则拖，拖不下去的时候，可以集体加入，但有三点必须注意：一、必须向全队讲清楚，使大家有个思想准备，取得队内的意见一致；二、个别队员坚决不愿参加和已被国民党监视有危险的人，应设法保护他们安全离队；三、最重要的一点，不要‘弄假成真’”^⑤。

一九三九年冬，周恩来同志来桂林的时候，曾在桂林中学的球场上召集了桂林的演剧队、新安旅行团讲了话。他特别关心“新

旅”的小朋友们，每次来桂林，都要到“新旅”住地去看望大家，与每个“新旅”战士亲切握手，慈祥而关切地询问大家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给大家分析抗日战争的形势，勉励他们为抗战多做工作，多演好戏，给全体团员极大的鼓舞。

“新中国剧社”是当时桂林戏剧运动的中流砥柱。该社拥有一流的戏剧家夏衍、田汉为他们写剧本，有一流的导演田汉、洪深为他们导演。他们的演员，演技也是高超的，如当时江西苏区三大歌舞明星之一，解放后拍摄的电影《赵一曼》中饰赵一曼、现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导演的石联星同志，解放后拍摄电影《蔡文姬》饰蔡文姬，现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名演员、名导演朱琳同志，都是“新中国剧社”的演员。这个剧社之所以能够成立并在桂林开展有声有色的活动，是与周恩来同志的关怀和支持分不开的。当时国防艺术社的李文钊，因接近进步力量被该社的顽固派排挤，便想自己成立一个剧社。为了办剧社，他把在榕荫路的一幢房子卖掉了。他知道杜宣同志在国防艺术社也受吴剑声这些反动势力的排挤，又是一个掌握《戏剧春秋》、有一班人马的实力派人物，便来找杜宣商谈办剧社之事。但杜宣同志听说李文钊与托派有关系，不敢贸然答应，便向李亚群同志请示，亚群同志说：“这事得请示胡公”（当时党内同志对周恩来同志的尊称）。周恩来同志经过周密考虑后指示：“可以干”。杜宣同志便到湖南南岳找来了田汉，又到广东坪石找了洪深，洪深答应每年来桂林导演两个戏。这样，“新中国剧社”便于一九四一年十月五日在桂林三大大戏院宣告成立了。原李文钊是社长，后来他顶不起剧社的开支，便将剧社交给杜宣等同志自理。后来剧社又遇到了困难，杜宣同志跑到重庆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周恩来同志问过详情后指示：“剧社一定要坚持，

经费问题，组织上可以支持。”在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和支持下，“新中国剧社”便在重重困难中坚持、发展、壮大了。

周恩来同志不仅从政治上关心桂林的戏剧运动，而且对剧作家的生活也极关心。抗日战争时期常来桂林导演的剧作家洪深同志，一九四一年夏，目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感到没有出路，全家服毒自杀。周恩来同志闻讯后，立即派人去救护，并资助洪深一家到桂林来休养。洪深深为感动，更积极地投身于戏剧运动。

党的领导也体现在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作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当时桂林虽然是国统区，是桂系军阀李、白、黄的天下，然而我们在许多单位，如广西大学、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广西军校、桂林高中、广西中山纪念中学、八桂镇小学等，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秘密支部；在一些戏剧团体如“抗敌演剧队”，“新安旅行团”等也建立有共产党的秘密支部。戏剧工作者就是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依靠集体主义的精神，吃大苦，耐大劳，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抗敌演剧队在秘密支部的领导下，战胜了国民党的强迫入党、“甄别谈话”、派特务入队长期监视等阴谋活动。

“新旅”的小战士们由于常常得到党的关怀和教育，革命意志特别坚定，战斗精神特别顽强。比如一九四〇年的深秋，他们排演大型舞剧《虎爷》，常常穿着单薄的衣服，排演完毕就在舞台过夜，用布幕当被子。他们冷得受不了了，就起身找几块破木板烧火取暖。《虎爷》正式上演之后，孩子们每天要从桃花江边的致和村步行到市中心的国民大戏院演出，晚上还要顶着深秋的冷风回到致和村，来回十多里，天黑、下雨、道路泥泞，从没叫过一声苦。他们“小的是十岁，大的未结婚，没有先生带，父母也不在”。如果没有党的组织的领导，他们能表现出如

此惊人的革命毅力吗？抗敌九队队长吕复同志说得好：“党的领导象一根红线贯串在我们全部演剧生活中。它引导我们用集体主义精神向黑暗、反动势力作斗争，同时培养锻炼自己的队伍，紧密依靠群众的支持，兢兢业业，诚诚恳恳，团结一心，为人民大众服务。”^⑥就是靠党的领导，才能使他们胜利完成党和人民所交给的抗日救亡的历史任务。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共产党员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在自己战斗的岗位上起先锋模范作用，党的领导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反之，如果共产党员贪图享受，党的威信在群众中就会降低，党的领导就会被削弱。值得自豪的是，在桂林抗战戏剧运动中，我们绝大多数共产党员的表现是好的，是起了先锋模范作用的，田汉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壮绝神州戏剧兵，浩歌声里请长缨”。这是田汉同志为西南剧展所作七律的头两句。其实他就是“浩歌声里请长缨”的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当日本法西斯的铁蹄蹂躏着中国大半个河山的时候，田汉同志正蛰居在湖南南岳从事写作，当他从杜宣同志的嘴里知道党要他到桂林来协助创办“新中国剧社”，从事戏剧工作，他二话不说，便带着老母和幼女来到桂林。他们住在花桥边沿街的一所极简陋的木板屋里。他常常在营养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凭借昏暗的豆油灯通宵伏案工作，为剧社赶写演出剧本。有时为了抢时间，他干脆拿起铁笔直接在蜡纸上书写，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吃大苦、耐大劳和高度负责的精神。田汉同志的生活是贫苦的，可是有一次当他知道“新中国剧社”的同志穷到揭不了锅，他便叫老母将家中仅有的十多斤米给剧社的同志拿回去煮粥充饥。他既是著名的戏剧家，免不了总有些阔人要请他吃饭，而他总是把在路上碰到的穷文艺工作

者统统拉去，迫使东道主原打算请一席的常常改为请两席、三席，事后他们便向人抱怨：“请田汉吃饭不容易”。田汉同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田汉同志不仅能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更注意帮助他们在工作上克服困难，扶持他们前进。有时国民党的将领不允许抗敌演剧队下部队演出，怕他们进行赤色宣传，动摇军心。田汉同志知道后，便去找这些将领。田汉同志是著名的剧作家，又写得一笔好字，国民党的将领很想得到他亲笔写的诗词，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一次，一个驻扎在庆远的国民党师长阻挠演剧队到他的部队演出。田汉抓住他的心理，给他写了一幅对联：“年年来归庆远县，一战直下昆仑关”。这本来有深刻的寓意，是赞扬我演剧队驰骋南北的，可这位师长拿到这幅对联后如获至宝，高兴地说：“演剧队是进步的，我们欢迎。”在田汉同志的支持下，工作便顺利地展开了。

又一次，一个富有爱国心的从东南亚回国的马戏团，由于国民党执行投降路线，回国后受到冷遇，流落到桂林。田汉同志知道了这个情况，多次去看他们的演出，给他们以支持和鼓励，使该团的艺人深感温暖、深受鼓舞。

为了充分发挥戏剧对抗日救亡的作用，田汉同志写了不少经验总结和论文，并对旧剧改革和利用提出了极宝贵的意见。他指出，“旧剧在目前被一班人注意，负有动员广大群众之任务”，“今日一定要把许多革

命的事实表演在舞台上，才不失其历史剧之意义。”关于旧戏能否表现抗战问题，他说，“只要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多加以改进”，旧戏“就可以配合抗战，为大众所真正需要的艺术。”^⑦总之，从田汉同志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党的领导作用的充分发挥。

上述情况充分证明，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戏剧运动之所以能出现生机勃勃的局面，与党的领导有密切的关系。在政治思想方面，是党给戏剧工作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是党给戏剧工作者最大的关怀和支持；在复杂的斗争中，是党给戏剧工作者以正确的指示；在困难面前，是党给戏剧工作者以巨大的激励。总的来说，桂林抗战戏剧运动，党的领导是灵魂。

注：

①转引自欧阳敬如：《回忆我的父亲欧阳予倩》，《文化史料》1981年1期。

②转引自欧阳敬如：《“迈进毋畏路途艰”——回忆我父亲欧阳予倩在广西》，《学术论坛》1981年3期。

③何仲勉：《抗日战争时期周总理在武汉》，《湖北文艺》1977年第二期。

④⑤夏衍：《周总理对演剧队的关怀》，《人民戏剧》，1978年3月。

⑥吕复、赵明：《演剧九队十一年》，《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二辑，第241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出版。

⑦《田汉对旧戏改革的意见》，《救亡日报》1939年4月28日。